政治科學論叢 / 第 108 期 / 民國 115 年 6 月 / 頁 101-132

必由之路？區域霸權與海外拓殖：明清兩代的史料檢視*

楊仕樂**

摘　要

美中無可避免的衝突，是近年來在中國崛起的態勢之下，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命題。循著霸權穩定與權力轉移的脈絡，美國是現今的全球海洋霸權，設定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則被認爲會挑戰美國此一霸權的地位，但強權崛起爲何就必然如此呢？美國崛起後也曾選擇孤立主義，何以中國的崛起卻不會？這就是單純粹物質因素的驅使嗎？還是理念因素也一樣重要？究竟是什麼因果機制，促使興起的強權在自己所在區域中達成大部分宜居土地的征服、成爲陸上區域霸權後，還繼續超出自己所在區域，展開海外拓殖並向全球伸展勢力，進而挑戰了既有的全球海洋霸權，產生世界領導權的爭奪與更迭？本研究嘗試以明、清的區域霸權爲案例，探究阻止他們海外拓殖的原因。如果強權尋求全球海洋霸權的道路上，在物質之外還視某種理念性的因素而定，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有助於釐清，當今美中衝突是否不可避免的爭議。

關鍵詞：區域霸權、全球霸權、美國孤立主義、明朝、清朝

---

* DOI:10.6166/TJPS.202606_(108).0003
本文爲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執行成果，計畫編號 NSTC 113-2410-H-606-008-。

**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E-mail: shihyueh@nhu.edu.tw。

收稿日期：114 年 4 月 8 日；通過日期：115 年 2 月 26 日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美中無可避免的衝突，是近年來在中國崛起的態勢之下，國際關係研究的主要命題。於此，學理上的爭論往往是，一邊主張現實主義的物質邏輯放諸四海而皆準，強者必霸、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古今中外一概適用（Mearsheimer, 2001）；另一邊建構主義的理念邏輯則認爲，古代中國有著獨特愛好和平的「王道文化」，不僅使強盛的中國能自我克制，中國的寬大仁慈也吸引周邊國家自願服從（Kang, 2010）。當然，即使認爲中國文化獨特，不能直接適用西方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1] 也同意當今的中共並不像歷史上中國的統一朝代，並不具有道德上的領導地位，故無法在今天重現過去促成長期和平穩定的東亞朝貢體系（Park & Kang, 2023, pp. 175-198），但這古代中國的朝貢體系，在同時也被認爲是種強迫。例如，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馬提斯（James N. Mattis）就在 2018 年時聲稱，中共有長期的計劃，打算「重寫既存的全球秩序」（“rewrite the existing global order”），並且認爲「明朝看來是他們設想的模式」，但會是一種「更強勢的形態，要求其他國家成爲朝貢國向北京磕頭」（“The Ming Dynasty appears to be their model, albeit in a more muscular manner, demanding that other nations become tribute states kowtowing to Beijing”）（Taylor, 2018）。[2]

有關中國過去朝貢體系的當代詮釋，的確被認爲是北京選擇性以和諧案例，來作爲外交上的政治宣傳（Hrubý, 2021, pp. 89-113），但純以現有的歷史案例研究成果來看，上述正反兩方的見解都不盡然正確。譬如以朝鮮爲例，對明朝的朝貢不是完全沒有強制壓迫，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基於文化認同的欽慕與順從（楊仕樂，2016，頁 159-196；楊仕樂，2017，頁 53-79；

---

1 建構主義觀點也不盡然就認爲中國文化特殊且愛好和平，而是主張必須考慮理念的因素。譬如，江憶恩就認爲中國的戰略文化其實與西方現實主並無不同，只是這並非物質的直接結果，而是理念建構的過程（Johnston, 1995）。類似的，重視物質因素也不盡然皆屬現實主義，譬如部分制度主義的理論，以及各種國內政治的解釋。有關不同理論學派對於美中衝突的不同看法，可參閱 Friedberg (2005)。

2 此說自然也引來駁斥，例如：Lo (202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2018a，頁 109-156；楊仕樂，2019，頁 39-73；孫衛國，2007，頁 187-210；2019）。從此，一個更根本但還有待探索的問題就浮現了：朝貢是強迫的也好自願的也罷，爲何明朝不像西方是越洋跨洲建立海外殖民帝國、進而發生全球海洋霸權的爭奪與更迭，反倒只是建立東亞的朝貢體系？這顯然不能說中國是以寬大仁慈來掩蓋自己的衰弱無力，眾所皆知在明朝國力巔峰之際，鄭和的艦隊相對於他國的壓倒性實力，甚至還超過今天的美國海軍的強大程度，就算沒有地理大發現跨進大西洋與南美洲，也完全足以在東南亞與非洲東岸展開殖民地的征服，何以鄭和的遠航無以爲繼？明朝之後，清朝的強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清朝根本就未曾發動遠航，不僅也只有朝貢體系，範圍甚至遠比明朝極盛時期要小。誠然，在清末中國轉趨衰弱的情境下，明、清兩朝沒有在強盛之際持續海外拓殖，多被定調是中國文化迂腐保守的結果（錢穆，1995，頁890-891）；但換個角度詮釋，儘管仍有相當的差異，亦可說是強盛時王道文化的寬大與自我克制（楊仕樂，2018b，頁 245-262）？如此一來，文化阻止海外拓殖、進而也無法成爲全球海洋霸權，這本來被視爲理所當然、無須多言的論點，反而變成是需要確切證據來支持了。

究竟，明、清兩代爲何從一開始就沒有在強盛時從事海外拓殖，進而意欲成爲全球海洋霸權、甚而挑戰既有海上霸權？是否就是保守文化的理念作用？明清兩代都有相同的保守文化，但明代曾進行遠航而清代全無此舉，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差別？這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歷史問題，而有高度的學理與現代意義。循著霸權穩定與權力轉移的脈絡（Kindleberger, 1973; Modelski, 1988; Organski, 1958），美國是現今的全球海洋霸權，設定了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中國則被認爲會挑戰美國此一霸權的地位，但強權崛起爲何就必然如此呢？美國崛起後也曾選擇孤立主義，容許既有霸權英國繼續主導世界，何以中國的崛起卻不會？這就是單純粹物質因素的驅使嗎？還是理念因素也一樣重要？究竟是什麼因果機制，促使興起的強權在自己所在區域中達成大部分宜居土地的征服、成爲陸上區域霸權後，還繼續超出自己所在區域，展開海外拓殖並向全球伸展勢力，進而挑戰既有的全球海洋霸權，產生世界領導權的爭奪與更迭？如果強權尋求全球海洋霸權的道路上，在物質之外還視某種理念性的因素而定，則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助於釐清，當今美中是否衝突不可避免的爭議。

貳、文獻探討

一、歐洲的海外拓殖

其實，要回答明、清爲何沒有從事海外拓殖，連帶也就未曾問鼎或爭奪全球海上霸權之位，不如先問爲何歐洲國家會走向這條路。對此，許多研究都指出了物質上的驅力，例如甘迺迪（Paul Kennedy）、斯卡梅爾（Geoffrey Scammell）的研究都認爲，歐洲侷促的地形迫使歐洲人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取得資源，使歐洲人更願意向外開拓（Kennedy, 1987, pp. 22-26; Scammell, 1989, pp. 60-76）。克勞利（Roger Crowley）也有類似觀點，他在研究葡萄牙的崛起時指出，國土狹小的葡萄牙無法向東參與地中海乃至中東、東亞的貿易，只得向西從大西洋另闢蹊徑，遂從北非開始沿非洲西岸不斷延伸，直至南美洲巴西（Crowley, 2015, pp. 17-18）。金德伯格（Charles Poor Kindleberger）也從貨幣金融的角度提出相同的看法，表示文藝復興後歐洲貨幣經濟興起，金、銀地位大幅提升，但歐洲境內缺乏這樣的物產，促使歐洲各國向海外尋找，因而導致地理大發現（Kindleberger, 1984, pp. 25-27, 35-44）。地理環境的差異也被進一步分析，譬如歐洲殖民主要擴展的對象是美洲，相對而言氣候較爲適宜、原住民人口較少且未發展出強大政治組織，比較容易殖民又離歐洲較近；至於中國在類似航程下可達的東南亞或環印度洋地區，則地處熱帶較不宜居且當地已有勢力，較不易進行殖民（Acemoglu et al., 2001, 2023; Morris, 2010; Pomeranz, 2001）。

不過，上述論點也無法完全回答，爲何東南亞硬是被比較弱且比較遙遠的歐洲殖民，而非比較近又比較強的明、清殖民，無怪乎也有許多論點會認爲，西方的海外拓殖是因爲西方有積極進取的文化。例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認爲，一種爲了填補地圖上空白之處的「探索與征服」心態，讓歐洲人願意承認自己的無知但不會膽怯自封，正是因爲這種心態才開創了大航海時代，萌發了歐洲人征服異域的野心（Harari, 2018, pp. 318-330）。帕里（John Horace Parry）也提出相同看法，他認爲歐洲人的探險精神在物質環境允許之後，讓歐洲人更勇於探索未知的世界，進而擴大了地理和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知識，並讓日後科學、技術和工藝三者產生緊密聯繫，成爲現代西方世界的基本特徵之一（Parry, 1973, pp. 1-18）。又例如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也認爲，全憑物質因素其實無法解釋西方航海的興起，因爲當時東方阿拉伯世界與中國的造船及導航科技都遠勝於歐洲，但歐洲即使在航海科技落後的時代仍積極向海外拓（Fernandez-Armesto, 2007, pp. 181-191）。

關於歐洲海外拓殖的文化，還有學者從宗教層面進行闡述。如坎貝爾（Thomas J. Campbel）、維奧爾特（Birdsall Viault）及理嘉（Robert Ricard）就認爲，中世紀以降基督教成爲歐洲人的精神支柱，進而讓歐洲人產生了拓荒傳教的熱忱，具體表現是歷次的十字軍東征，以軍事行動來達成傳教的目的，也因此當航海工藝愈發成熟之後，這種傳教與征服的浪潮也隨之推向海外（Campbell, 2022; Viault, 1991; Ricard, 1966）。諾布勒（Adam Knobler）同樣認爲基督教信仰促成十字軍東征，是歐洲人向外擴張的驅力（Knobler, 2016, pp. 5-29）；馬爾多納多－托雷斯（Nelson Maldonado-Torres）也有類似的觀點，認爲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與其宣揚基督教「福音」的文化有密切關係（Maldonado-Torres, 2014, pp. 691-711）。

當然也有研究認爲西方海外拓殖，是物質性與理念性因素共同的結果。潘恩（Lincoln Paine）就指出，探索海洋是沿海的民族必然產生的現象，可謂是「靠海吃海」，但當滿足基本生存之後，是否願意再向更遠的海洋發進？驅動因子各地是不盡相同，各種物質與理念層面上的因素，都有可能促使近海民族繼續向遠洋發展。歐洲之所以往後能壟斷海洋的發展，只是驅動歐洲向更遠海洋發進的因子，較世界其他地方更多元（Paine, 2013）。李約瑟（Joseph Needham）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爲中國從西元一世紀到十五世紀，在約莫一千五百年間，科技是遙遙領先於西方，如果此情況持續下去，那麼地理大發現應由中國完成，實際的情況卻是歐洲後來居上、取而代之。原因在於西方自文藝復興後，在短短的數百年間發生了一連串的連續巨變，促使歐洲從理念上改變物質結構，再因物質結構改變理念，這種交互作用的延續性衝擊，正是中國所缺乏的（Needham, 19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美國的孤立主義

相對於歐洲未有國家達成陸上霸權就紛紛轉向海上拓殖，美國則在十九世紀末成爲北美洲陸上霸權後，開始走向海外拓殖，在二次大戰後也終於走上全球霸權之路，但當全球海洋上的爭雄，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一路拚搏下來，美國在一次大戰後大有順勢取代英國的條件，但美國卻在此時選擇了退縮，時興孤立主義。這究竟是爲何呢？對此，一些研究認爲，孤立主義其實就是常態，美國遠離歐洲建國就是要擺脫歐洲的紛擾。例如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就認爲，美國的建國目的就是擺脫歐洲干擾，早在 1823 年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中就已確立，而一次大戰後走向孤立主義，只是美國重回既定國策罷了（Morison, 1924, pp. 27-51）。愛德華（Jason A. Edwards）也認爲，孤立主義本是美國的立國傳統，也因此即使十九世紀末美國已是強國，卻還是秉持孤立主義精神，只將自己定位於美洲區域之內，就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具備全球霸權的條件，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也準備讓美國制定國際規則，但美國民意仍是選擇孤立主義（Edwards, 2018, pp. 176-195）。

不過如赫林（George Cyril Herring）的研究則認爲，美國立國之後產生孤立主義只是當時現實考量下的決策。畢竟，美國此時仍只是小國寡民，缺乏對抗歐洲列強的軍事實力，拿破崙敗亡後歐洲列強已無共同威脅，彼此間又形成互不侵犯的共識，若聯合起來指染美洲美國將難以招架，因此才有門羅主義的出現（Herring, 2008, pp. 153-155）。同樣的道理，也有研究認爲，一次大戰後美國的孤立主義，也不是什麼一貫的傳統使然，而是當時的現實考量所至。阿德勒（Selig Adler）就主張，戰後美國的孤立主義，是出於對一次大戰參戰經驗的利弊分析，當時美國威爾遜總統本想藉由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建立讓美國領導世界，但美國參戰取勝卻一無所獲使當時的政治菁英普遍認爲，這樣作會讓美國在許多議題上得與他國妥協，不僅犧牲獨立性也容易捲入衝突，根本得不償失（Adler, 1957, pp. 201-215）。

上述的分析將美國的孤立主義與美國的物質因素相聯繫：大洋阻隔是美國安全的屏障、地跨兩洋之後所囊括的豐沛資源，更讓美國有實施孤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主義的資本。不過，一些研究則根本反對孤立主義這個說法，也就將理念性的因素帶入討論。例如史密斯（Marion Smith）就指出，美國建國之初就積極拓展海外貿易，所謂「孤立主義」必須是如同十七世紀的中國那般閉鎖，由此觀之孤立主義從來就不是美國的風格。他更直指，「孤立主義」一詞是在 1920 年代首見於媒體後，才開始被廣泛濫用，只要美國持續與各國有互動，那就會有價值觀和利益的衝突，就不可能保持孤立（Smith, 2013, pp. 5-47）。麥克杜格爾（Walter Allen McDougall）也認爲，以孤立主義指稱美國外交並不洽當，因爲美國立國之初追求獨立，雖是爲了不涉入歐洲國家的糾紛，但並非與歐洲國家斷絕交流，因此美國外交的傳統應該正名爲「不干涉主義」（non-interventionism）（McDougall, 1998, pp. 39-40; Quinn, 2010, pp. 50-52）。薩夫古良（Areg Savgulyan）也認爲，孤立主義說法並不準確，應稱之爲「中立主義」（neutralism）較妥（Savgulyan, 2013, pp. 162-170）。

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研究同樣反對「孤立主義」的說法，甚至也駁斥美國有「不干涉主義」與「中立主義」。他指出美國歷來的外交思維中，本來就有對外干涉與否上的擺盪，會因主政者及社會氛圍而有差異，影響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美國有時的確會表現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態度，表態不插手他國事務，卻又倡議反戰、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等教條，仍有強烈對外宣教的使命感（Mead, 2013）。伯恩斯（Adam Burns）也指出，美國的從東向西擴張是出於一種「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思維（Burns, 2017, pp. 8-29），這本來僅止於美國在北美洲大陸上的擴張，但後來卻成爲美國各種海外拓殖的理由。莫克（Frederick Merk）與邦妮絲特莫克（Lois Bannister Merk）就認爲，雖然「昭昭天命」論並非當時美國社會的共識，是後世史學家對美墨與美西戰爭的刻意渲染，但不可否認美國的確是有將對外宣教視爲使命的思維，成爲後來美國海外拓殖的重要因素（Merk & Merk, 1995, pp. 29-60）。穆拉夫奇克（Joshua Muravchik）更將「昭昭天命」論內化爲美國外交的成分，認爲美國自認有義務透過援助、貿易、教育，甚至國際危機的處理，向全球輸出自由民主的價值（Muravchik, 1991），可謂與歐洲文化一脈相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明清的陸地保守

美國地跨兩洋成爲區域霸權，在物質上有孤立的條件，當全球海洋霸權的地位已唾手可得卻興趣缺缺，使得本來看似與美國南轅北轍的中國，似乎有了相通之處。誠然，明、清的陸地保守與美國的孤立主義，不論是當時的區域情勢或建國歷程上，情況差異都相當巨大，不似明、清，美國是歐洲移民所成立，且在北美的權力眞空中成長。不過，國際關係理論的初衷，本就是從看似南轅北轍的歷史案例中，基於類似的關鍵理論變數，嘗試建立通則（譬如古希臘兩大集團與當代冷戰兩大集團，因均屬兩極體系而進行類比）。就此而言，明、清兩代強盛時的中國也是區域霸權，就像美國那般也可謂地大物博，物質條件上不像地狹人稠的歐洲有海外拓殖的必要。然而，強盛的中國是僅一時從事遠航，但強盛的美國卻是僅一時閉關自守，如此極端的反差是否就是相似物質因素之外，不同理念因素的作用呢？明、清是否就是缺乏美國那承繼自歐洲勇於開拓的文化，少了這種理念性的推力？不過，如同前文所述，對於明、清爲何沒有海外拓殖，現有的研究大多沒有去思考中國與美國相似的物質條件，而是直指中國文化的迂腐保守，產生了理念性的阻力。

錢穆就認爲，明代以八股文爲考選政府官員的標準，造成明代士人與官僚僅知應付考試，精熟聖賢名言卻學問空疏，是明代知識分子的通病（錢穆，1995，頁 696-701）。張華也發現明代這群學問與現實脫節的士大夫，持有一種「重德輕利」的保守價值觀，當豐歲民樂這群人會自傲地認爲「守聖履道」自然民生樂利，無須汲汲營利；當歉收民困這群人則認爲「君子固窮」，艱困時更要強調道德而不可輕棄節操、鑽營謀利。是以明成祖之後，君主並無實踐海洋帝國的雄心，且國家經濟基礎日愈穩固，政府官僚更堅守「重德輕利」遂停止遠航（張華，1984，頁 136-143）。

陳方正也認爲中國知識分子重「學」，是道德的、抽象的知識；西方知識份子重「術」，則是物質的、實體的知識。中國在歷史文明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多次改朝換代，但學術思維架構是延續的，沒有出現把「學」拋棄、由「術」主導的情況。西方卻是在「術」之上不斷的「叛逆」，不斷的典範轉移。也因此，西方在航海技術、資本力量達到足以支撐遠航後，會繼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航海技術、資本力量等「術」翻新、改良，務求更加實用；相對的，中國在航海技術、資本力量達到足以支撐遠航後，反而會思考遠航的正當性、道德性（陳方正，2021；2016，頁 136-143）。周振鶴也認爲，明朝的統治階級有其「大陸性」，厲行海禁將整個社會侷促於陸地空間之中，在此「大陸性」的統治意識形態下，沿海地區的人民不過是「以海爲田」，富裕之後不會購置船隻，而是設法成爲地主，將資本投向符合「大陸性」的經濟活動。就連鄭和下西洋的意圖，也主要在於宣示大陸帝國的國威，只是想強化「大陸性」統治的合法性（周振鶴，2006，頁 89-105）。

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認爲鄭和的遠航其實有商業動力。例如蘇瑜（Yiu Siu）就認爲，遠航的動機是明成祖爲了跳過官僚集團擴充私產，故由信任的宦官主導航務，遠航獲利不入國庫而是歸明成祖直接支配，大幅強化了皇權（Siu, 2023, pp. 1-20）。既然是經商就得要賺錢，成本效益的考慮也很重要，如毛佩琦與李焯然的研究就認爲，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萬邦來朝，透過「耀兵異域」的手段來完成，既然南洋已朝貢不斷，就無需再繼續出航（毛佩琦、李焯然，1994，頁 251-255）。何況遠航是所費不貲，例如蔡石山的研究就指出，遠航一次就耗費驚人，終止遠航是爲了彌補財政匱乏（Tsai, 2008, pp. 205-243）。前述克勞利也認爲財政匱乏是停止遠航的主因，他估計出航一次的費用就是明成祖當朝歲收的一半以上（Crowley, 2015, p. 19）。

不少研究還點出了遠航中不同團體的考量，不純然只是中國保守文化的理念性因素。前述費南德茲－阿梅斯托就認爲，明朝內部有商人利益團體希望開放海禁、佛教利益團體希望獲得宣教經費與機會、強調道德的士大夫團體想藉由遠航宣揚「以德服人」價值觀，這三者融合下戰勝了明朝建國以來的傳統保守士大夫勢力，進而讓蒙古裔的伊斯蘭信徒鄭和可以主導遠航計畫。然而隨著明朝內部局勢日愈穩定，以儒家聖賢教誨的八股文科舉考試，讓傳統士大夫勢力愈加龐大，拓展冒險的壯舉在違背聖賢之道的批評下，成爲勞民傷財的錯誤政策。對內安民才是最符合儒家官員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再加上北方蒙古勢力復振，必須收回航海經費重新面對陸上強敵，讓明朝海上事業戛然而止（Fernandez-Armesto, 2007, pp. 143-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孟西士（Gavin Menzies）也認爲，明成祖晚年連續出現極端天象，再加上年事漸高氣力衰老，無法承受壓力而下詔罪己，但官僚集團見此不僅不慰聖心，還紛紛上諫批判明成祖好大喜功，導致明成祖心力交瘁進而重病，之後仁宗繼位當天，就下令停止所有遠航相關事宜（Menzies, 2008, pp. 59-70）。耿振華同樣認爲，鄭和下西洋無法再現有多重原因。在經濟上是因爲永樂末年，官府發行的紙鈔已開始貶值，在政治上則是明成祖重用宦官導致明仁宗、宣宗兩朝宦官亂政，在文化上則是傳統士大夫保守思潮的限制，這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鄭和之後就再無鄭和（耿振華，1989，頁317-335）。

很可惜的是，由於明朝後來銷毀了關於鄭和航海的一切紀錄，以求禁絕後世再發此想，上述諸多研究往往是邏輯推演甚或想像，而卻乏深入的史料探索。至於明朝之後清朝爲何不作遠航嘗試，就更是乏人問津了，有者如前所述也是想當然耳的保守文化決定論。少數研究如江曉輝，指出清末中國遭受列強侵略後，梁啓超、康有爲等維新份子才開始推廣「航向大洋」的思維（江曉輝，2023，頁 79-123），但爲何此前不做海外拓殖，則未有深究。

論及清朝與海洋，現有研究多只透過檢索當時的文學作品，以此推論出當時仕紳的海洋想像（林美清，2011，頁 119-151；廖肇亨，2008，頁41-71），但這僅止於文人雅士個人的浪漫看法，具體研究則多只聚焦「海『禁』政策」（朱宗軍、韓增林，2009，頁 60-63；孫立新、趙光強，2012，頁 92-96；羅樂然，2022，頁 559-588），以此反推清朝的保守與封閉的，將海洋視爲海盜之類的問題根源，而不是財富與機會的場域（劉平，2016，頁 97-105）。近期如布琮任的研究，主要也是以筆記詩文等，透過測量繪圖、海洋生物紀錄等，來反推清朝如何看待，或說如何排斥向海洋發展（布琮任，2021）。

參、研究架構

從既有研究中可知，興起強權走向海外拓殖，進而爭奪全球海洋霸權，有其物質性的因素，也有理念性的因素，不是邏輯上的必然直接聯繫，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爲中國崛起就自然進入與美國全球海洋霸權的權力轉移導致美中衝突，可說是一種跳躍。[3]

下表 1 彙整了強權興起時，是否走向全球海洋霸權爭奪的純粹物質性前提條件差異。從第一列中可以呈現，若是同個區域內的多個強權之一，因在區域內無法克服他國的聯合抵抗、成不了陸上區域霸權，才不得已得走向海洋；也正因爲他們作爲全球海洋霸權的陸上資源基礎薄弱，所以才有較強的動機去維持此一難得的位置；而在同一區域中的其他強權，也因而有較強的動機與較大的成功機會，去挑戰鄰近同區域的既有全球海洋霸權（Wohlforth, 1999, pp. 5-41），這是歐洲的狀況。[4] 相對的，若是佔據區域內絕大部分宜居土地的陸上區域霸權，豐沛的陸上資源之下就沒有與區域內多極之一那般的壓力與動機，得去爭奪全球海洋霸權的位置，強權的擴張傾向在跨越區域霸權的門檻後就會下降（Mearsheimer, 2001），這是北美

表 1
強權興起時前提物質結構的差異

是否尋求全球海洋霸權？	
歐　洲 興起強權是同區域中的多極之一	北美洲 興起強權是區域霸權

中國崛起後的全球權力分配結構		
歐洲：多極	北美：區域霸權	東亞：區域霸權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3 美國控制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封鎖了中國出海的航路，而這又是中國從海外獲取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通道，可能是中國崛起後有與美國爭奪海洋霸權的務實物質動機。不過，從海軍戰略的角度而言，這種威脅可透過潛艦的通商破壞形成嚇阻而抵銷（Till, 2013; Vego, 2009），仍不需與美國爭奪制海權；何況油氣資源亦可從陸地油管線輸送，且石油其實也只佔中國全部能源消耗的五分之一以下，亦有許多代用品與新能源科技可填補（Yang & Vocke, Jr., 2012, pp. 503-514），這也就是本文所述區域霸權在陸地上疆域廣闊，資源可自給自足。

4 這些論述往往被用來說明，當今美國全球海洋霸權之強是史無前例且難以挑戰，但也能說明過去葡、西、荷、英等全球海洋霸權之間，爲何有激烈的更迭之爭。

臺灣人文學期刊資料庫

洲的狀況。[5] 第二列繼續呈現了，中國在崛起爲陸上區域霸權之後，是否就要與美國爭奪全球海洋霸權，其實並無物質上邏輯的必然性。作爲陸上區域霸權的中國，並不是如過去曾爲海洋霸權的歐洲各國那般只是區域中多極之一，如上所述，再去爭奪全球海洋霸權的動機較弱；而美國作爲另一區域的霸權，使全球體系裡有兩個區域霸權，並不一定就要像同區域的多極之間那般，去競爭全球海洋霸權，各據一方分治世界也說得通。

既然前提物質條件不具決定性，理念性因素就成爲關鍵的中介變數。儘管陸上區域霸權跨海越洋向外擴張進而尋求、爭奪全球海洋霸權的物質性動力較弱，但究竟是否擴張爭霸，仍得視不同的理念因素而定。的確，一如前文所述，在既有研究中，有關明、清兩代爲何沒有海外拓殖，多未能與美國的孤立主義實例相聯繫，而直指就是中國文化保守的理念性阻力所致，但這是否只是中國自詡的仁慈與寬大？明清兩代之間又有何不同，都還有待考察。

於此，雖然鄭和航海的紀錄都已被銷毀，關鍵決策與轉折過程的討論記錄也一併消失，但在明朝官方史料《明實錄》中仍有不少線索可循。《明實錄》保留了大量的重要史料及文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 1930 年起校勘《明實錄》，並以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進行《明實錄》的散頁修補、改正，之後歷經三十餘年的持續編修，終於在 1962 年出版，並於 1984 年另增編二十冊附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無日期），再於 2016 年 9 月 19 日完成數位化資料庫建置，無償公開各界使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初步以關鍵字檢索，《明實錄》中關於鄭和的記載有

---

5 此一邏輯可能會被認爲是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但即使是攻勢現實主義代表性的學者也不主張，如美國這般的區域霸權會因強大，就繼續進行更大規模的擴張，畢竟廣大水域有制止力，區域霸權只會在最後關頭出手介入其他區域，採取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策略（Mearsheimer, 2001）。這類觀點往往也不主張美國該在冷戰結束後維持全球海洋霸權地位，反映了區域霸權與區域內多極之一所面臨的不同壓力（Layne, 1993, pp. 5-51）。換言之，就守勢現實主義（Tang, 2010）而言，因爲權力平衡或守勢優勢，根本上往往就會阻止興起強權成爲區域霸權，也就難以挑戰既有的美國全球海洋霸權；又或是興起強權再向外擴張，其實收到內政因素的驅動（Rose, 1998）。而本文於此則是提出，即使採用攻勢現實主義邏輯，就論證中國崛起就必然會去挑戰美國全球海洋霸權，亦有待商榷。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9 筆、南洋有 10 筆、西洋 240 筆，航也有 107 筆、航海 23 筆、水師 12 筆，海防更有 562 筆、海外 68 筆。另外，既有文獻中提到有關遠航終止的因素，諸如財政收支、北方蒙古的威脅、士大夫集團的意識形態，也都有不少紀錄，如錢糧有 2,620 筆、韃靼也有 369 筆，仁有 6,689 筆、孝 7,862 筆、聖賢 210 筆、道統 39 筆等，均可深入探索。

清朝官方史料《清實錄》更是有待考掘。一如《明實錄》，《清實錄》也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史料及文獻，於民國初年由前清遺老、北京大學團隊與中研院團隊共同合作編纂（朱賽虹，2006，頁 571-577），中研院版本也與《明實錄》一併於 2016 年 9 月 19 日，完成數位化資料庫建置，並無償公開各方使用。《清實錄》中雖也缺乏有關是否遠航的繁複往返討論記錄，但同樣初步以關鍵字檢索，《清實錄》關於南洋有 94 筆、西洋 313 筆、海外則有 267 筆，航 42 筆、航海 165 筆，水師更多達 1,873 筆、海防也有 253 筆。可能與是否遠航有關的財政收支、士大夫意識形態等，也有許多記載，例如稅 4,454 筆、銀 29,272 筆、錢 15,155 筆、仁 13,531 筆、孝 18,558 筆、聖賢 6 筆、道統 55 筆等，亦均可作爲研究的素材。

面對如此大量的資料，又大多很可能不是直接關於是否遠航的詳細決策討論，本文無法採用特定重大決策的過程追溯辦法，而得改採類似「文字探勘」（text mining）的途徑，來處理《明實錄》與《清實錄》中的相關記載，以關鍵詞的檢索初步篩選出相關的文字記錄，然後從這些不同論點出現的比例，進行總體研判。

首先，基於前文美國孤立主義的線索與表 1 所彙整的物質條件比較，明、清兩代反對遠航應有其物質上的考量，從前文的討論中大致可推論出三種：

其一，地大物博、生產豐足，無須再對外開拓。

其二，外敵威脅，徵兵籌餉負擔沉重。

其三，成本效益，遠航入不敷出、得不償失。

接著，基於前文對既有研究的討論，若說明、清沒有海外拓殖除在物質條件上就沒有動機之外，眞是因爲中國的保守文化，其邏輯也大致可推演爲以下三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一，重義輕利、重農抑商，人民應努力耕種、節制物慾，不應對經商獲致暴利致富趨之若鶩，使人心浮動。

其二，天人感應的學說，災荒的發生代表爲政者不仁，須檢討施政。

其三，倫理道德，涉險又離鄉背井不能盡孝，即使獲利可期仍不可取。

從此，如果明、清不從事遠航，眞如既有研究所認爲，就是因爲文化保守之故，那我們在明、清實錄的史料中，應該主要只會見到理念三種論述的出現，物質三種論述則應相對少見；但若物質因素也如本文所提出也有重要性，那麼物質三種論述也應經常出現。

肆、研究發現

依據前述六種類別的檢索目標，本文對明清兩代的史料初步進行了考察，其中發現了相似但也相當不同的結果。

一、明朝

明朝方面，首先關於保守文化阻止遠航的命題下，重義輕利與重農抑商的觀點的確十分常見，在史料中共計出現 51 次，例如，早在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398 年 2 月 10 日），就以仁義治國訓示大臣：「上曰：『…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太祖・卷二十九）明成祖也曾在永樂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1417 年 12 月 27 日）以「重義輕利」褒獎地方官員：「…工部右侍郎蘭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闊達，有大節，讀書通古今，重義薄利，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太宗・卷一百九十四）明宣宗洪熙元年八月二日（1425 年 9 月 13 日），明宣宗平定維吾爾族動亂後，訓勉大臣明朝是以寬厚仁義待人，夷狄則見利忘義故自取其敗：「上謂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兒之地，我朝置衛設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見利忘義，今之敗實其自取。然朝廷馭夷，叛則討，順則撫，彼能悔過，歸誠朕何吝寬貸。』」（宣宗・卷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人感應的觀點較少，但在史料中也共計出現 27 次，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正月二日（1398 年 1 月 21 日）就已天人感應之道訓誡大臣：「上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愼之。」（太祖・卷二十九）明成祖永樂七年六月二十七日（1409 年 8 月 8 日），明成祖訓斥出納處長官竟認爲水災只是偶發事件，不識天人感應之道：「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有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言守賢，守賢更須擇言，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太宗・卷九十三）明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1425 年 2 月 3 日）也申明天人感應之道：「朕惟君國之道，事天爲大，事天之實，恤民爲本我。…。…」「天道人事，未嘗判爲土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示警皆有惕勵修省之誠，未嘗忽也。…。」（仁宗・卷六下）

至於倫理道德的觀點在史料中出現又更少，僅 12 次，例如明太祖鑑於蒙元以來禮教崩壞，在洪武五年三月四日（1372 年 4 月 7 日）重定禮教律令後，宣告晚輩遠行，返家後隔日早晨一定要向父母、祖父母請安：「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凡子孫之於祖父母，每旦必詣前肅揖，若遠出，隔旬日而見。…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太祖・卷七十三）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八月五日（1517 年 8 月 21 日），大臣以古代君王遠遊招禍，上諫明武宗不應遠遊：「周穆王窮海遠遊，致有祁招之箴，漢武帝深夜微行，致有逆旅之辱，前鑒不遠，惟聖明深念之…」（武宗・卷一百五十二）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1598 年 10 月 23 日）孝定皇太后懿諭皇弟潞王朱翊鏐恪守祖訓，盡孝悌、不遠遊：「聖母慈諭傳與子潞王知道：「爾自之國以來，我每望爾力行孝弟，…爾數出禁城，挾重遊遠，我一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不勝傷感憤恚，…今爾不遵祖訓，罔惜身名，違禁私出遠行，招引無賴之輩，殊失體統，意欲何爲？如有不測之事，必然憲典難容我命…」（神宗・卷三百二十六）

相對的，因爲物質因素反對遠航的觀點，地大物博在史料中僅出現 8 次，例如，明太祖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1370 年 7 月 13 日），明太祖對外表示中國地大物博：「…朕有天下，物產之富，貢賦之入，軍國爵賞之費取用不竭，…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太祖・卷五十三）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四月二日（1382 年 5 月 15 日）大臣上奏邊界鄰國地處產水銀、青綠泥、紫泥，願出兵奪取，明太祖斷然拒絕，認爲中國地大物博，無須爲小物微利動兵：「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太祖・卷一百四十四）明成祖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 年 12 月 28 日），遣鄭和賞賜印度南部柯枝國國王鎮山碑，勉勵其效法明成祖上應天心、遵古崇賢，則國內將可如中國風調雨順、物產豐饒：「遣中官鄭和等，賫…仍賜柯枝國王可亦里印誥，並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上親製碑文，賜之曰：『…柯枝國遠在西南鉅海之濱，出諸番國之外，慕中華而歆王化久矣，…及於我乃數歲以來，國內豐穰，居有室廬，食飽魚鼈，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長，熙然而樂，凌厲爭競之習無有也，山無猛獸，溪絕惡魚，海出奇珍，林產嘉木，諸物繁盛倍過尋常，暴風不興，疾雨不作…朕茲德薄，何能若是？…。』」（太宗・卷一百八十三）

兵餉負擔沉重在史料中就出現 33 次，例如，明太祖洪武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1382 年 3 月 10 日）朝掃蕩元朝盤據雲南的殘黨，資料顯示時值明朝建國已有十五年，仍有兵糧匱乏的問題：「上以大軍征南，兵食不繼，命戶部令商人往雲南中納鹽粮以給之。於是戶部奏定商人納米給鹽之例，…」（太祖・卷一百四十四）明仁宗朝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1424 年 12 月 10 日）的史料顯示，明朝屯田歷經太祖、成祖等近六十年仍未見成效，邊防軍糧供給仍有壓力：「…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効，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仁宗・卷四下）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四月一日（1540 年 5 月 6 日），地方士兵陳情表示兵糧極度匱乏，懇請明世宗要求開太倉支給：「邊人言：『…諸邊芻粟告匱，宜遣大臣齎太倉銀分投糴買芻粟給發緊要城堡以備主客兵支用。』…。」（世宗・卷二百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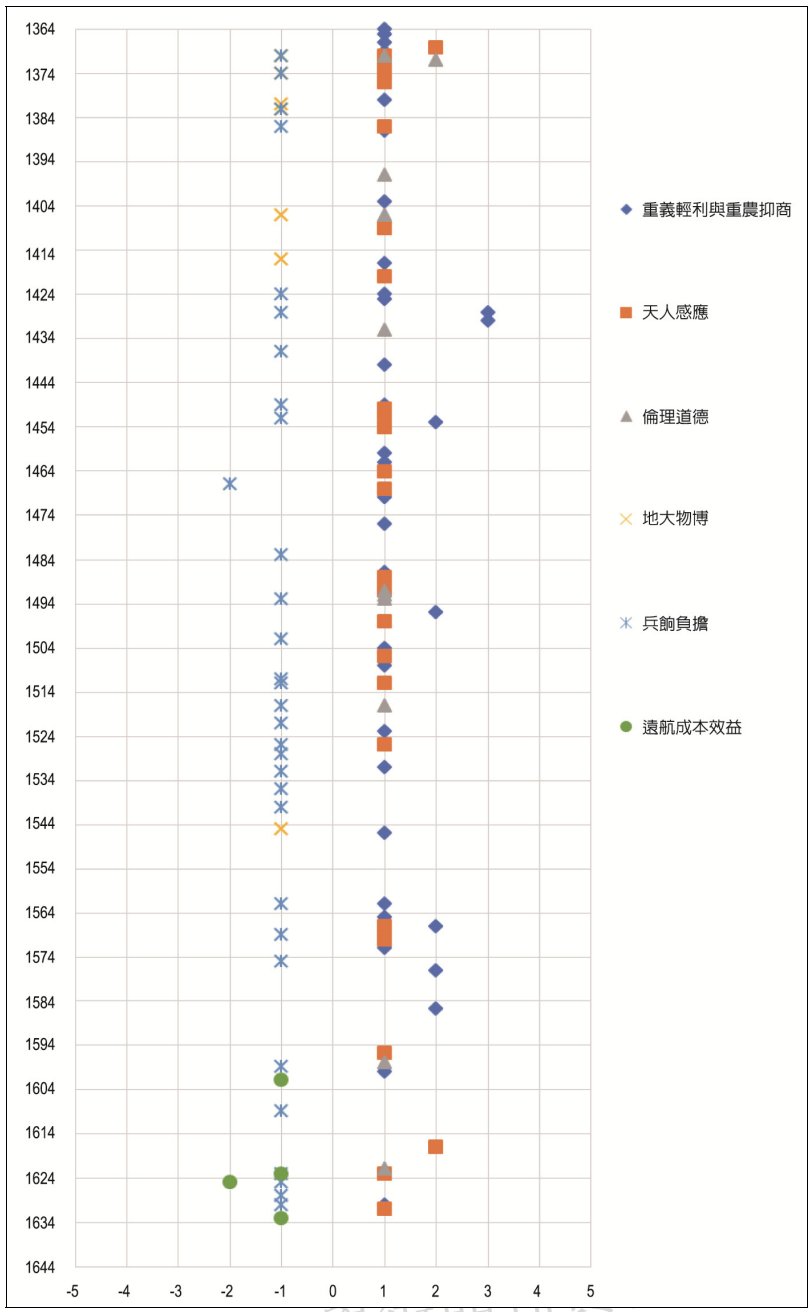
至於遠航成本效益不彰，在史料僅出現 5 次，例如明熹宗朝軍方屢屢上奏海軍軍需項目耗費極爲龐大，天啓三年六月四日（1623 年 7 月 1 日）：「兵部覆督師樞輔孫承宗疏謂…海上舟師固爲牽制，…船租、工料、水手、兵食等項，所費巨萬，聽輔臣移檄浙、直，撫、按、鹽、諸臣查照原題拜量，那運司之銀，酌議妥當招集發行。…。」（熹宗・卷三十五）天啓五年四月二十六日（1625 年 5 月 31 日）：廣東道試御史陳世　疏言：「…今國家所憂者兵與餉耳。…毛帥果能相度其地而使遼兵遼民屯之，不惟安插遼人，且省航海糜費無算。…」（熹宗・卷五十八）明思宗崇禎二年六月十四日（1633 年 7 月 19 日），大臣上奏指出遠洋寶船造價昂貴：「航海必先造船，此船規製長十七丈、闊三丈有奇，曰艎，曰舵，曰桅，採自關中，非數百年之木不用，非数萬人之力不能運。聞往時船完或二年或三年，木植工價與臣等種種供應，費皆不貲。」（史語所藏鈔本崇禎長編・卷二十三）

純就出現次數的狀況而言，阻止明朝遠航的主要因素的確是理念性的保守文化所致（三類共計 90 次，佔 66%），不過物質性的因素也有一定的作用（三類共計 46 次，佔 34%）。但若在時間上來看，則發現保守文化中阻止遠航最主要的成分，重義輕利與重農抑商，在 1600 年以後就極少出現，反而先前所未見遠航成本效益不彰的觀點在此時出現，這也顯示了物質因素在明朝不持續遠航的決定中，其實有相當關鍵的分量（詳見下圖 1，其中 X 軸刻度代表次數，是從當年同類資料出現次數累加而得出，例如 1364 年第一類出現一次，藍色菱形的類別符號在 X 軸上就位於刻度 1，若有兩次則會位於刻度 2，依此類推。理念性的第一、二、三類在右半邊以正數表示；物質性的第四、五、六類在左半邊以負數表示。各類別佔比見下表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明朝史料中關於遠航的論述類別與時間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表 2
明朝不從事海外拓殖的原因類別比例

明朝不從事海外拓殖的原因		次數	佔比
理念性 三類共出現 90 次，佔 66%	重義輕利、重農抑商	51	56.6%
	天人感應	27	30.0%
	倫理道德	12	13.3%
物質性 三類共出現 46 次，佔 34%	地大物博	8	17.3%
	兵餉負擔沉重	33	71.7%
	成本效益不彰	5	10.8%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清朝

接續在清朝，關於保守文化阻止遠航的命題下，重義輕利與重農抑商的觀點出現也很普遍，史料中共計出現 31 次，例如清世祖順治元年五月十八日（1644 年 6 月 22 日），大臣上奏國政要綱七條，當中包含重農。「保定副將王應登等條陳七事：一立綱紀，二任賢良，三靖遺寇，四申招撫，五和兵民，六重農務，七懲貪婪。…。」（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之五）清世宗雍正五年三月三日（1727 年 3 月 25 日），清世宗誥諭內閣務須重視發展農業，以固國本：「諭內閣：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先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五十四）清高宗乾隆二年五月十三日（1737 年 6 月 10 日），申敕國家重農務本之道，並訓斥大臣務須推廣農業、強調國家重農務本的政策：「命重農務本。諭王大臣等：『昔者虞廷咨牧，食哉惟時，而百揆奮庸之後，即命棄以播時百穀，禮樂兵刑，皆在所後。良以食爲民天，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棄置者亦或有之。縱云從事耕耘，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異，南人尚多不諳，北民率置不講。此非牧民者之責，抑誰之責歟？…』著：該部即會同九卿，詳悉定議以聞。」（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四十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天人感應的觀點，史料中共計也出現 22 次，例如清世祖順治十四年十月五日（1657 年 11 月 10 日），清世祖因地震，對天人感應有所警惕，鼓勵大臣諫言：「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王永吉因災異上言天人相感，其理甚微，欲消變異必修政事缺失，欲知政事缺失必求諫諍直言。…今地震京師，皇衷悚惕，行將下詔求言。」（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二）清世宗雍正七年五月二日（1729 年 5 月 29 日），清世宗重申天人感應之道的重要性，並以此訓斥臣工：「屢年以來，朕以天人相感之理，諄諄曉諭內外臣工，蓋朕實切敬天勤民之念於寤寐之中，而確見其感應之不爽。尤願各省督撫、有封疆之重任者體朕此心，至誠至敬，各盡其道，以爲感格上天之本。」（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一）清高宗乾隆七年七月十二日（1742 年 8 月 12 日）也因江南、淮、徐等處水患成災，以天人感應之理訓斥地方官民：「江南、淮、徐等處，連年遭值災傷，…朕覽奏深爲惻然。…從來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或本地大小官吏政治不修，愆尤暗積，或民人心術險僞，風俗澆漓，均足以上干天和，於雨暘旱潦之間，顯示警戒。…，此天人感應之道，捷於影響，斷無或爽者也。用是特頒此旨，諄諭地方有司思過省愆，以各盡父母斯民之責，…。」（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

倫理道德的觀點在史料中亦出現 21 次，例如，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五日（1682 年 6 月 10 日），清聖祖認爲南明戰犯罪犯離鄉背井甚爲可憐，流放北地已足懲戒，無須流放至黑龍江：「流徙寧古塔、烏喇人犯，…南人脆弱，…遠離鄉土，音信不通，殊可憫惻，雖若輩罪由自作，然發遼陽諸處安置，亦足以蔽其辜矣。」（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二）清高宗乾隆八年七月十六日（1743 年 9 月 3 日），華北發生糧荒，清高宗下令全力賑災，以避免災民離鄉背井：「天津、河間被旱，業已蒙恩撥米五十萬石，以濟冬賑。…速將現奉運米賑卹之諭旨，遍行曉諭，俾土著之民欲覓食他處者，靜以待賑，不必輕離鄉井。…」（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九十七）清仁宗嘉慶九年二月十三日（1804 年 3 月 24 日），清仁宗也以越南使節離鄉背井多年，開恩准許回國：「…因思從前隨同黎維祁內投，編置佐領之安南人等，雖經給有廩糈，團聚安居；但遠離鄉土，已閱多年，情殊可憫。著：加恩准令回國，以遂其懷歸之志…。」（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二十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質因素阻止遠航方面，地大物博在史料中則只出現 8 次，例如清高宗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日（1766 年 2 月 10 日），清高宗在即位三十年時，詔告天下國家地大物博，人民生活安康富樂：「茲荷蒙上天眷佑，列祖鴻庥，函夏謐寧，疆宇式闢，北庭、西域二萬餘里咸隸版圖，外有耕屯之穫，內無餽餉之勞，且連歲年穀順成，庶物豐殖，京通倉貯，儘有餘粟。」（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七百五十二）清仁宗嘉慶十年八月二十五日（1805 年 10 月 17 日），清仁宗即位十年時舉行祭祀，表示清朝上應天命，地大物博，國家欣欣向榮。「…我朝誕膺景命，式廓鴻圖，昌祚龍興，恢基東土，緬維瀋陽遼海，天作奧區，神模肇域，重光繼序，篤慕升歆。…。」（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十九）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三日（1845 年 9 月 4 日），清宣宗在慶祝皇太后七十大壽時表示國家富足，將豁免各地方在道光二十年前的各項欠稅：「…本年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海寓乂安，民物豐豫，…，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並借給耔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稅等項，著：『各該督撫將軍府尹等，將道光二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晰查明該省所屬某州某縣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候朕降旨全行豁免。』…」（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之四百二十）

兵餉負擔沉重史料中就多得多共出現 29 次，例如清高宗乾隆六年五月二十日（1741 年 7 月 2 日），大臣上奏軍費繁浩，入不敷出：「戶部左侍郎梁詩正奏『度支經費莫大於兵餉。伏見每歲春秋二撥解部銀，多則七八百萬，少則四五百萬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須一千一二百萬，入不敷出。」（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四十三）清仁宗嘉慶五年三月六日（1800 年 3 月 30 日），因征討天理教軍費繁浩：「…現在軍務尚未蕆事，一切兵餉供支，皆須發帑接濟，固應寬爲籌備，…。…百姓逼於飢困，不得已而從賊，是欲剿平賊匪，必先使吾民各安生業，民安而賊自可平。多安一民，即少一賊，此事理之必然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之六十一）清宣宗道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1827 年 3 月 18 日），因鎮壓張格爾亂事，軍費繁浩，清宣宗要求大臣設法張羅：「本日鄂山等奏，軍營剋期進京，轉餉愈遠，請續籌銀兩備用。此次回疆軍需，前經發給餉銀六百萬兩。據鄂山等節次撥解大營軍餉…共發過銀六百三十八萬八千八百六十九兩零。現在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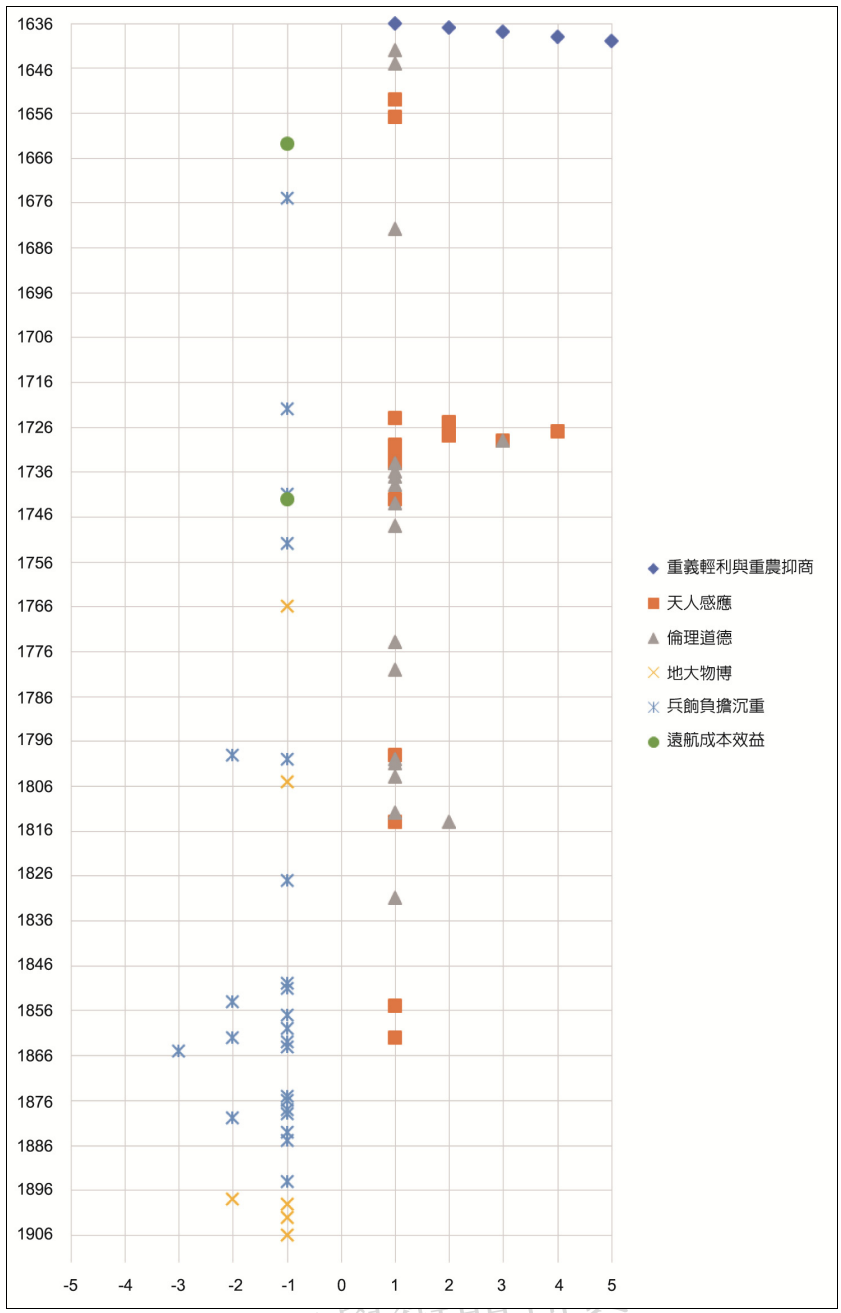
兵雲集，分路進勦，支發鹽菜草乾等項，每月約需銀三十餘萬兩。指日大兵奏凱，辦理善後事宜，經費浩繁，尤應寬爲籌備。…。」（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之一百十四）

至於遠航成本效益不彰在史料則僅出現 2 次例如，清太宗天聰七年十月十日（1633 年 11 月 11 日），清太宗明示當前清朝無法負擔以海船遠攻山東、山海關的損失：「爾漢啓心郎生員等，動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爲言。夫航海至危之事，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於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取，此豈非欲航海者咸沒於水欲攻險者，致損其兵乎？我國方承天眷，甫集之兵民無幾，若少虧損，何以克成大業？」（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之十六）。清高宗乾隆七年九月二十八日（1742 年 10 月 26 日），大臣上奏海路難測：「山東巡撫晏斯盛奏稱『登萊等府不通河道，洋面水勢最險，東省船隻，從無一至彼者，若令江省放舟逾越大洋，至萊載穀，復航海至蘇，輓運抵淮，不獨風濤洶湧，抑且輓運迢遙。…』…。」（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七十五）

同樣純就出現次數的狀況而言，阻止清朝遠航的主要因素的確是理念性的保守文化所致（三類共計 74 次，佔 65%），物質性的因素看似與明朝相同也有一定的作用（三類共計 39 次，佔 35%），但若進一步再從時間分佈上來看就會發現，相對於物質因素是大致平均出現於明朝全期，在清朝時這物質上考量的論點幾乎只在晚清的十九世紀後半中出現（39 次中 1840 年以前出現的只有 9 次，相對理念因素總計 74 次中的 72 次，都在 1840 年以前），可見在清朝強盛時強烈就是保守文化阻止遠航遠，尤其在十七與十八世紀初期的短時間內，分別有對重義輕利與重農抑商、天人感應觀點的不斷反覆強調（詳見下圖 2，其中 X 軸次數刻度，是從當年同類資料出現次數累加而得出，例如 1636 年第一類只出現一次，藍色菱形的類別符號在 X 軸上就位於刻度 1，若有兩次則會位於刻度 2，依此類推。理念性的第一、二、三類在右半邊以正數表示；物質性的第四、五、六類在左半邊以負數表示。各類別佔比見下表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
清朝史料中關於遠航的論述類別與時間分布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表 3
清朝不從事海外拓殖的原因類別比例

清朝不從事海外拓殖的原因		次數	佔比
理念性 三類共出現 74 次，佔 65%	重義輕利、重農抑商	31	41.8%
	天人感應	22	29.7%
	倫理道德	21	28.3%
物質性 三類共出現 39 次，佔 35%	地大物博	8	20.5%
	兵餉負擔沉重	29	74.3%
	成本效益不彰	2	5.1%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伍、結語

在常見的霸權穩定與權力轉移的理論脈絡下，中國崛起挑戰既有的霸權美國，設定、取代現行由美國所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導致美中間無可避免的衝突，成了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想法。不過，本文提出何以成爲陸地上區域霸權後，就非得走向海外設定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疑問，並以美國在一次大戰後的孤立主義爲例，將美國、明朝、清朝這三個乍看之下沒有關係的歷史案例，連繫在一起。相對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離開了全球海洋，就只是歐洲區域內的多極之一，美國曾經採取的孤立主義，說明了陸地上區域霸權在物質條件上，並無迫切的壓力走向海外設定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從而說明了理念因素對於促使陸上區域霸權走向全球海洋霸權的重要性，而這也確實在明、清兩代的史料中發現了映證，本文提供了較系統性的證據而不再只是推理。與美國不同，明、清兩代的確是如既有研究所認爲，都沒有像美國那般源自歐洲宣教式熱情的海外開拓思想；但本文的進一步發現也與既有研究所見顯著的不同，明朝終止海外遠航的因素並非只是文化保守，物質上的考量也很重要，僅有清朝才是強烈只因保守文化，而不事遠航。

理想上，在上述的研究發現之餘，朝堂上的話語競逐與結果，應是後續進行詳細過程追溯研究的對象，不過如同前文所述，在明、清實錄中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缺乏這些繁複的往返討論記錄，故而本文僅能先以研究紀要的型態，作出現類別次數與時間分布的呈現。如此的初步研究發現固然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考察與檢索，但對當前國際情勢已有重要啓示與意義。不似霸權穩定與權力轉移表面上的物質性外在客觀環境理論路徑，從中所導出的美中無可避免的衝突，其實更多是內在主觀理念因素使然。如同一開始美國前防長對明朝朝貢體系的批評，西方透過自己經驗的有色眼鏡看待古代東方的經驗，把自己出於文化的理念性驅力強者必霸觀點，說成是物質上的必然且四海皆準。同樣的，經歷過西方帝國主義、種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之後，也因爲西方所帶來的科學、文明、先進的優越感，這種本屬西方的強者必霸理念恐怕也成爲當代普遍的觀念，可謂是人心早已不古。

換言之，如果說美中間眞有無可避免的衝突，那不是權力關係上中國崛起必然挑戰美國霸權，不是什麼強權政治的悲劇宿命，而是現實主義的意識形態。不過，既然是理念的作用，就還有改變的可能，在經歷了這麼多戰爭與苦難之後，人類應當能體認到自己的命運不該也不必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於此，知識界對於美中不可避免衝突的論點，進行不斷的挑戰與批判，就是維繫和平促進合作的重要力量。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未註明。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2023/11/15。[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6). *Database of Ming Veritable Records, Joseon Wangjo Sillok, and Qing Veritable Records*, November 15, 2023.]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未註明）。**明實錄附校勘記及附錄**（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2 年刊本縮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n.d.). *Colla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to the Ming veritable records* (Abridged from the 1962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毛佩琦、李焯然（1994）。**明成祖史論**。文津。[Mao, P.-Q., & Li, Z.-R. (1994). *Ming Chengzu shilun*. Wenchin Press.]

布琮任（2021）。**海不揚波：清代中國與亞洲海洋**。時報出版。[Bu, C.-R. (2021). *Hai*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bu yangbo: Qingdai Zhongguo yu Yazhou haiyang.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朱宗軍、韓增林（2009）。中國海洋觀的變遷。**海洋開發與管理，26**(6)，60-63。[Zhu, Z.-J., & Han, Z.-L. (2009). Zhongguo haiyangguan de bianqian. *Ocean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6*(6), 60-63.]

朱賽虹（2006）。民國時期故宮明清檔案整理、研究與出版。載於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八十華誕暨國際清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71-577）。紫禁城出版社。[Zhu, S.-H. (2006). Minguo shiqi Gugong Ming-Qing dang'an zhengli, yanjiu yu chuban. In the Palace Museum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Qing history for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pp. 571-577). Zijincheng Press.]

朱賽虹（未註明）。**清實錄**。故宮博物院。檢索日期：2023 年 11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dpm.org.cn/ancient/mingqing/141965。[Zhu, S.-H. (n.d.). *Qing Shilu*. Palace Museum. Retrieved November 22, 2023, from https://www.dpm.org.cn/ancient/mingqing/141965]

江曉輝（2023）。地理、進化與文明：梁啓超、康有爲海外詩中的世界圖像。**清華學報，53**(1)，79-123。[Jiang, X.-H. (2023). Geography, evolution and civilization: Images of the world in overseas poems by Liang Qichao and Kang Youwei.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53*(1), 79-123.]

周振鶴（2006）。以農爲本與以海爲田的矛盾：中國古代主流大陸意識與非主流海洋意識的衝突。載於蘇紀蘭（主編），**鄭和下西洋的回顧與展望**（頁 89-105）。科學出版社。[Zhou, Z.-H. (2006). Yi nong wei ben yu yi hai wei tian de maodun: Zhongguo gudai zhuliu dalu yishi yu fei zhuliu haiyang yishi de chongtu. In J.-L. Su (Ed.), *A review of and a reflection on Zheng He's voyages* (pp. 89-105). Kexue Press.]

林美清（2011）。清代臺灣賦中的放逐意識。**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1)，119-151。[Lin, M.-Q. (2011). Exile ideology in Taiwan fu of Ching dynasty.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1), 119-151.]

孫立新、趙光強（2012）。中國海洋觀的歷史變遷。**理論學刊，1**，92-96。[Sun, L.-X., & Zhao, G.-Q. (2012). Zhongguo haiyangguan de lishi bianqian. *Theory Journal*, *1*, 92-96.]

孫衛國（2007）。義理與現實的衝突：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漢學研究，25**(2)，187-210。[Sun, W.-G. (2007). The conflict between orthodox thought and reality: Choson's pro-Ming/anti-Qing sentiment as seen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attitudes of the 95 drifting persons from Taiwan in 1667. *Chinese Studies*, *25*(2), 187-210.]

孫衛國（2019）。**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Sun, W.-G. (2019). *From "Honoring the Ming" to "Submitting to the Q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oson Korea's Attitude towards Qing China, 1627-1910*.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耿振華（1989）。關於鄭和下西洋資料考訂的回顧。**臺北市立師範學院學報，20**，317-335。[Geng, Z.-H. (1989). Study on the fact of Cheng-Ho's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retrospect. *Journal of Taipei Municipal Teachers College*, *2*0, 317-335.]

張華（1984）。明初的物質文明與鄭和下西洋。**南京大學學報，4**，136-143。[Zhang, H. (1984). Ming chu de wuzhi wenming yu Zheng He xia Xiyang.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4*, 136-143.]

陳方正（2016）。試論西方地理大發現的文化與歷史淵源兼及與中國的比較。**中國文化，1**，68-99。[Chen, F.-Z. (2016). Shilun Xifang dili da faxian de wenhua yu lishi yuanyuan jian ji yu Zhongguo de bijiao. *Chinese Culture*, *1*, 68-99.]

陳方正（2021）。**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爲何出現於西方**。中華書局。[Chen, F.-Z. (2021). *Jicheng yu panni: Xiandai kexue weihe chuxian yu Xifa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楊仕樂（2016）。中國文化與中國對外行爲：「興滅繼絕」理念與朝鮮「壬辰倭亂」。**政治科學論叢，**（70），159-196。[Yang, S.-L. (2016).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a's behavior: "Help the weak and aid the needy" in 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0), 159-196.]

楊仕樂（2017）。東亞朝貢體系的實證檢驗：朝鮮的案例研究 1618-1637。**問題與研究，56**(1)，53-79。[Yang, S.-L. (2017).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East Asian tribut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Korea 1618-1637. *Wenti Yu Yanjiu*, *56*(1), 53-79.]

楊仕樂（2018a）。崛起中國的權力政治或文化認同？歷史上中韓關係的實證檢驗 1368-1449。**遠景基金會季刊，19**(1)，109-156。[Yang, S.-L. (2018a).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s rise: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hinese-Korean relations 1368-1449. *Prospect Quarterly*, *19*(1), 109-156.]

楊仕樂（2018b）。中國是獨特的嗎：從清朝的十次戰爭來看。載於吳玉山（主編），**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頁 245-262）。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Yang, S.-L. (2018b). Is China unique? A perspective from the ten wa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In Y.-S. Wu (Ed.),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45-262).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楊仕樂（2019）。漸變乎？驟變乎？明代中期以後朝鮮對中文化認同的歷史案例研究。**政治學報**，(68)，39-73。[Yang, S.-L. (2019).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A historical case study of Korea'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fter mid Ming dynast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9-73.]

廖肇亨（2008）。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2)，41-71。[Liao, Z.-H. (2008). The world order in the maritime poetic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32), 41-71.]

劉平（2016）。清朝海洋觀、海盜與海上貿易（1644-1842）。**社會科學輯刊**，(6)，97-105。[Liu, P. (2016). Qingchao haiyangguan, haidao yu haishang maoyi (1644-1842). *Social Science Journal*, (6), 97-105.]

蔡石山（Tsai, S.-S. H.）（2008）。永樂皇帝（江政寬譯）。聯經。（原著出版於 2002）[Tsai, S.-S. H. (2008). *Perpetual happiness: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C.-K. Chiang, Trans.). Linking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2)]

錢穆（1995）。國史大綱（下）。**商務印書館**。[Qian, M. (1995). *Guoshi dagang - Xia*. Commercial Press.]

羅樂然（2022）。朝鮮士大夫對清初海洋秩序重組的情報收集與對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4**(3)，559-588。[Luo, L.-R. (2022). Reordering maritime order in the early Qing period: Chosŏn intellectuals' perspectives and respons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4*(3), 559-588.]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23).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Public Affairs.

Adler, S. (1957).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 century reaction*. Free Press.

Burns, A. (2017).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3-2013*.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ampbell, T. J. (2022). *The Jesuits, 1534-1921: A histor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from its found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The Encyclopedia Press.

Crowley, R. (2015). *Conquerors: How Portugal forged the first global empi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ndom House.

Edwards, J. A. (2018).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Donald Trump and redefining the U.S. role in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66*(2), 176-195.

Fernandez-Armesto, F. (2007). *Pathfinders: A global history of expl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iedberg, A. L. (2005).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2), 7-45.

Harari, Y. N. (2018).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Harper Perennial.

Herring, G. C. (2008).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 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rubý, J. (2021). Establishing a common ground: Admiral Zheng He as an agent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Malaysia. In J. Ptáčková, O. Klimeš, & G. Rawnsley (Eds.), *Transnational sites of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Central Asia,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and Europe compared* (pp. 89-113). Palgrave Macmillan.

Johnston, A. I. (1995).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Ming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ng, D. C. (2010). 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19*(4), 591-622.

Kennedy, P.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Random House.

Kindleberger, C.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Kindleberger, C. P. (1984).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Routledge.

Knobler, A. (2016). *Mythology and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 Brill.

Layne, C.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4), 5-51.

Lo, A. (2021, January 5).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ribute syste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116543/use-and-abuse-history-chinese-tribute-system

Maldonado-Torres, N. (2014). Race, religion, and ethics in the modern/colonial world.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42*(4), 691-711.

McDougall, W. A. (1998).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world since 1776. Houghton Mifflin.

Mead, W. R. (2013).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Routledge.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W. W. Norton & Company.

Menzies, G. (2008).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Merk, F., & Merk, L. B. (1995). *Manifest destiny and mis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A re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odelski, G. (1988).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Macmillan Press.

Morison, S. E. (1924). The origin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775-1823. *Economica*, (10), 27-51.

Morris, I. (2010).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Profile Books.

Muravchik, J. (1991).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 AEI Press.

Needham, J. (195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ganski, A. F. K. (1958). *World politics*. Alfred A. Knopf.

Paine, L. (2013).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

Park, K., & Kang, D. C. (2023). Unipolarity, hegemony, and moral authority: Why China will not build a twenty-first century tributary system. In Z. Wang (Ed.), *The long East Asia: The premodern state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acts* (pp. 175-198). Palgrave Macmillan.

Parry, J. H. (1973). *The age of reconnaissance: Discovery, exploration, and settlement, 1450-1650*. Cardinal.

Pomeranz, K. (2001).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Quinn, A. (2010). *U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xt: National ideology from the founders to the Bush doctrine*. Routledge.

Ricard, R. (1966). *An essay on the apostolate and the evangelizing methods of the mendicant orders in New Spain: 1523-157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se, G.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144-172.

Savgulyan, A. (2013). USA isolationism policy during the reign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1933-1941). *Main Issues of Pedagogy and Psychology*, (2), 162-170.

Scammell, G. (1989). *The first imperial age: European overseas expansion 1500-1715*. Routledge.

Siu, Y. (2023). The cessation of Zheng He's voyages and the beginning of private sailings: Fiscal competition between emperors and bureaucrat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8*(1), 1-20.

Smith, M. (2013). The myth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Commerce, diplomacy,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34), 5-47.

Tang, S. (2010).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Taylor, A. (2018, June 20). Mattis compared Xi's China to the Ming Dynasty. Xi might be happy to hear it.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6/20/mattis-compared-xis-china-to-the-ming-dynasty-xi-might-be-happy-to-hear-it/

Till, G. (2013). *Seapower: A guid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Vego, M. (2009). *Operational warfare at sea: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Viault, B. (1991).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McGraw Hill.

Wohlforth, W.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1), 5-41.

Yang, S.-Y., & Vocke, W. C., Jr. (2012).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ircraft carrier development saga: A technological and geostrategic analysi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4*(4), 503-5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ad to Destiny? Regional Hegemony and Overseas Expansion:
A Review of Ming and Qing Primary Sources*

*Shih-yueh Yang***

Abstract

The inevitable conflict to occu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s been the main focu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today's global maritime hegemon shaping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s. China is rising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challenger to the hegemonic statu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why must this outcome be inevitable? The United States once chose isolationism after its rise. Why shouldn't China do the same? Is this driven by purely material factors? Or are ideational factors just as important? What is the causal mechanism that drives a regional land-based hegemon, after conquering most of the land in its own region, to expand beyond and bid for global maritime hegemony, leading to a competition over world leadership? This study attempts to take the regional hegemon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cases of regional hegemony to explore the reasons that prevented them from engaging in overseas expansion. If a great power's pursuit of global maritime hegemony depends not only on material factors but also on certain ideational factor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can clarify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whether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inevitable.

Keywords: Regional Hegemon, Global Hegemon, American Isolationism,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

* DOI:10.6166/TJPS.202606_(108).0003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E-mail: shihyueh@nh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